

# 与古为徒，或左翼影人的另面

王贺

相较之下，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、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，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，有待今人批判、继承、发展，迄今仍是一未知数，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，似仍显得有些单调、平淡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的“软性电影”论争中，左翼影人王尘无可谓一重要角色。其与唐纳、鲁思、史枚等人一道，与刘呐鸥、穆时英等被定义为“软性电影”论者，展开了激烈论争。在一篇小文中，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：

尘无(1911—1938，江苏海门人)，原名王承谟，笔名尘无、王尘无、摩尔、向拉、方景亮等。曾就读于持志大学。1932年7月，与沈西苓等合办左翼电影评论刊物《电影艺术》，另在上海《时报·电影时报》等处发表有大量影评和《电影讲话》《电影在苏联》《中国电影之路》等论文。《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基础》之外，其批评“软性电影”之文，还有《清算刘呐鸥的理论》《刘呐鸥的责任》《夜记之什(一)·“软性电影”的毁灭》《毒药与圣药》等。著有《浮世杂拾》《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》。(王贺：《穆时英研究三题》，《汉语言文学研究》2018年第4期)

事实上，王尘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是中共党员，亦属地下党领导、支持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总盟、影评小组成员。其竭力批判“软性电影”，或属临危受命之举，亦未可知，但诸种电影史、文学史论著并拙文在内，均视之为一早逝的左翼电影批评家，几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、面相。然而，近阅张伟、祝淳翔编《唐大郎纪念集》(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下简称《纪念集》)见载唐大郎诗文、掌故，竟发现多笔王尘无研究资料，颇有助于我们打破此前对其形成之“刻板印象”(stereotype)。

据唐大郎所记，其与王尘无订交于1933或1934年，“时为细雨溟濛之晨，尘无来访唐瑜，唐瑜为愚兄，尘无乃力扬愚小诗之美，为之悚然，盖愚知尘无，工旧诗，文亦清致幽远，如愚犷野，胡足见称。愚平时自傲，恒人誉吾诗佳者，必勿悦，以为彼又何知者。而尘无忽致其颂词，则又惶恐不敢受，患其过奖，而不作由衷论也。”(《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》)但在此之前，唐已知尘无工于旧诗，尽管其所见者，只限于尘无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，仍“诵而爱之”，

以为其“清微幽远，似出晚清人手”。如其病中得诗“白头父老呈霜柿，素手村姑荐蜜茶，不道先生非税吏，病余来看早梅花”，清新质朴，浑然天成，颇为友人津津乐道(《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》《看梅花》)。

1937年春，由张道藩编剧、黄天佐导演的《密电码》于南京、上海等地放映。当其试映之晨，唐大郎以起身太迟，未及往观，其一友人称“战争场面甚好，口号太多，是一出正经戏也”。而王尘无则“在湖上作《杜鹃篇》”(《密电码》试映)，惜未见此篇全貌，此后似亦未见其有关《密电码》之影评发表。《密电码》一般被认为是国产谍战片的“开山之作”，虽然不一定是“软性电影”，但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、党派政治立场上，要对其作出批判并不费力。

王尘无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订诗集，交邓钝铁(龚翁)，并谓“毕生心血，尽于此耳”。其中收诗数百首，大多为作者朱笔删去，只余三十余首，自谓“一生有十首诗可传，则死且无憾”，请邓氏更为删削，最后仅剩十余首。(《尘无删剩之诗》《龚翁遵尘无遗志》)但此说似亦不甚确。因唐大郎另文称，在王尘无亡故后，邓钝铁董理其遗稿，“得诗九十余首”(编者欲更删去二三十首)“《吞声小记》二万余千字”，且“诗经叔范、禹钟校定”，沈禹钟作序，邓氏则为其题跋。

此处《吞声小记》中的“吞声”，即王尘无。1935年末，唐大郎有补白《听潮白鹭怕雄飞》，称：“王先生近来颇有绮行，其心上人则亦诗亦影，在诗中乃亦及之也。诗云：‘开过靡芜了了春，佳期正值此芳辰，圈中自有颜如玉，何必临渊羡别人。’”因故有人作调吞声诗，可发一噱。

作诗之外，王尘无亦偶有壮语。在致友人书札中，即有“适当午睡，闻隔岸炮声，极易入梦！”数语，虽寥寥十余字，却被称为“神来之笔”。(《尘无神来之笔》)遗憾的是，近现代文言散文向来较少研究，目前尚不确定尘无之文言文章多否，



▲ 20世纪40年代卡尔登大戏院办公室内的唐大郎



▲ 董天野绘《江南才子唐大郎》



▲ 丁聪画唐大郎(扮演黄天霸造型)，刊1947年4月24日《沪报》

能入方家之法眼否。

如果说子曰诗云，尚属旧式文人之积习，那么，王尘无还有超越同侪的另一特长，不可不提，此即从事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。唐、王的共同好友陆小洛即“常读尘无所辑之报”，且以其长篇小说《江湖艳史》为上，而另一长篇小说《欲海鸳鸯》则等而下之。唐大郎评

论道：“尘无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间，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。”并作怀尘无一诗：“记从马路见芳踪，一件大衣像斗篷，无复能诗偏作影，却因相骂颇怀公。江湖艳史双肩，欲海鸳鸯一望中，不尽沧桑人事也，尘无竟似有尘封！”(《怀尘无》)慨乎言之。而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，固然受到西洋翻译文学的影响，更源自中国漫长的

说部传统，尤其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传统；其作者亦多属与古为徒的旧式文人。

与王尘无日常酬酢者，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、邓钝铁、陆小洛，至少还有陈灵犀、施叔范、王小摩、李培林、薛白雪、蔡兰言、曹聚仁等人(《诗书画三绝茶萃一堂》《酒令》)。有一次施叔范自华北归沪，适值王尘无返自杭城，诸人宴饮，“席上行口令，各人念一句古诗，或现成名词，或成语皆可，惟其字中须有口字，或字之构造中，附有口字者”，如唐大郎“诵‘一辆汽车灯市口’，则顺次而数，第五人与第七人皆饮酒，又如灵犀言‘皆大欢喜’，则第三与第四人，各饮两杯，盖欢喜二字，乃有两个口字也。于是有人念浑浑噩噩一语，噩噩二字，每人各吃四杯，而座上杨君，忽念一人名曰‘沙不器’，于是第三人亦饮四杯，一时谑浪笑傲，喧然并作。当入席之始，各人座上，皆有名单，惟并不直写其姓名，而作类如度语之文句”“愚号大郎，则书曰‘且问郗哥儿’，直以愚为三寸钉矣。又如灵犀曰‘一点通’，蝶衣曰‘金粉’，尘无则曰‘玉洁冰清’，胥出龚翁之手”。(《酒令》)

1938年夏，早已归乡的王尘无，以病犯沉疴、咳血而死。对其死状、死因及此事如何播闻至沪、友人如何不胜痛悼等情事，唐大郎亦有相当亲切之记述：

战后，兄养病里门，至上月始闻其将避地来孤岛，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来，诩愿望久之，而踪影杳然。昨日龚翁先生得海门朱公羊君来函，谓尘无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时，以咯血过多，致溘然作古。龚翁得书，遂告灵犀，灵犀以电话询培林，培林复以电话询尘无介弟。其弟尘笠，执事于本埠某钱肆，初问尘无如何矣，则谓不久且得家报，三哥虽在病中，然无大碍也，因告以公羊之书，其弟大恸，陡忆一二日前，有乡人来，初未言尘无已死，曷往觅之，一询究竟，以是更觅乡人，乡人固言，尘无已病死，惟渠离乡时，王家人囑其勿传尘无噩耗，使尘笠伤心